

欧盟与世界丛书

丛书主编：陈志敏 戴炳然

双层互持

冷战后欧盟对东亚的地区间外交研究

朱天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欧盟与世界丛书

丛书主编：陈志敏 戴炳然

双层互持

冷战后欧盟对东亚的地区间外交研究

朱天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层互持:冷战后欧盟对东亚的地区间外交研究/

朱天祥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欧盟与世界丛书)

ISBN 978-7-208-15223-6

I. ①双… II. ①朱… III. ①欧洲联盟-对外政策-

研究-东亚 IV. ①D8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2640 号

责任编辑 史美林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双层互持

——冷战后欧盟对东亚的地区间外交研究

朱天祥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2.25

插页 4

字数 171,000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223-6/D·3229

定价 42.00 元

丛 书 主 编：陈志敏 戴炳然

丛书副主编：曹子衡 陈玉刚 丁 纯 潘忠岐

丛 书 顾 问：冯仲平 梅兆荣 宋新宁 伍贻康 夏立平

叶 江 [比利时] 古斯塔夫·盖拉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市欧洲学会

欧盟委员会让·莫内教授项目

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丛书总序

20 世纪是欧洲大变身的百年。在这之前,欧洲因为率先实现了技术突破,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一跃成为世界的主宰。然而,欧洲列强之间的争斗也在 20 世纪上半叶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其结果,一方面欧洲退出了世界超级强权的行列;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地区一体化实践开启了大门。意识到欧洲国家地位的衰落,也为了永久结束欧洲各国内部之间的战争,六个西欧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不断增加,具有了单一的货币,高度一体化的内部政策,统一的对外经济和商业政策,以及不断发展起来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欧盟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在对外贸易、投资和援助领域领先世界各国,其核心成员国占据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全球核大国俱乐部中也拥有两个席位。欧洲一体化让数个世纪的宿敌实现了和解,并让欧洲继续跻身世界主要力量的行列。

进入 21 世纪后,欧洲联盟经历大规模的扩大,目前成员国已经增加到 28 个,拥有 5 亿人口。此外,还有土耳其、马其顿、冰岛、黑山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等国被赋予入盟候选国地位,正在就加入欧盟进行谈判。2009 年 12 月,欧盟的《里斯本条约》最终生效,给欧盟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欧盟在世界上的影响,条约对欧盟的原有对外政策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赋予欧盟独立的国际法人

地位；设立了常设的欧洲理事会主席一职；设立了常设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统一负责欧盟政府间主义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和超国家主义的原欧共体对外关系事务；建立了高级代表领导的欧洲对外行动署；原欧共体驻外使团全面转化为欧盟驻外使团，并受欧盟对外行动署的领导。

当然，在一体化继续向前推进的同时，欧盟也面临三大严峻的挑战。首先，欧洲联盟的深化或扩大进程正在进入瓶颈阶段，继续向前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能力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在扩大方面，土耳其的入盟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暴露出欧盟在扩大方面的困境；在深化方面，法国和荷兰民众 2005 年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显示欧洲民众对欧盟联邦化进程的努力缺乏支持，这将制约欧盟今后任何大幅度深化欧盟一体化的努力。其次，欧盟经济在 2008 年开始爆发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受创严重，不仅经济实力遭到削弱，作为欧洲一体化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的欧元也因此陷入危机。作为一个主要依靠经济力量和制度吸引力来发挥国际影响的国际行为体，欧盟目前遭遇的经济困难将明显制约欧盟在国际上发挥影响的抱负。最后，可能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欧盟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长期地位陷入相对衰落。欧盟内部加强一体化的努力也许会放缓这一相对衰落的进程，但长期趋势似乎难以根本改变。

鉴于欧盟面临的上述挑战，国内外学者已经展开了对欧盟重要性的辩论，一些学者认为欧盟已经处在衰落的下降通道，一些学者坚持欧盟仍然是世界的第二超级强权。在本丛书的主编们看来，就长期趋势而言，欧盟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相对下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当下和未来 30 年中，欧盟以其联盟和成员国的实力与影响仍将是世界主要力量之一，今后也仍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也将是中国双边关系中的关键伙伴，以及中国全球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对欧盟与世界关系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其意义不言自明。具体而言，对欧盟与世界关系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欧盟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个国际组织的相互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关系的全局有其影响,也是地区和全球问题解决过程中不能回避的方面。

第二,从对外政策的机制研究而言,欧盟的对外政策机制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包含了超国家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和政府间主义的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形成了联盟和成员国共同参与欧盟对外关系的多层对外政策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所谓的“后现代体系”,而不是一个放大的民族国家。对它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论研究,也是我们构想在其他地区或在全球层面发展区域或全球治理机制的经验源泉。

第三,就外交政策的模式研究而言,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主要是以“民事力量”的面貌出现的,即主要依靠非军事手段来发挥影响。在欧盟周边地区,欧盟主要通过周边政策对周边国家的国内制度和内外政策实行“欧洲化”改造,在其他地区则依靠经济、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力来扩大影响。对于实行和平发展外交战略和旨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而言,欧盟发挥影响力的方式显然有众多可资借鉴的地方,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

第四,就中欧关系研究而言,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复杂化的新阶段。对于双方而言,双边关系既有着巨大的合作机会,也蕴含着各方面的挑战,需要双方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关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同时,中欧关系已经全面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而具有日益重要的全球层面影响,既关系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发挥。

基于上述理由,本丛书的主编们提出了出版“欧盟与世界丛书”的设想,并得到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欧洲学会和欧盟委员会让·莫内教授项目的共同支持。复旦大学是国内最早设立欧洲研究的高校,在欧洲研究方面具有40多年的历史,聚集了一批在欧盟经济、外交、法律方面的研究人员。上海市欧洲学会作为联系上海

欧洲研究学界的桥梁机构,近年来在推动上海欧洲研究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从1998年欧盟委员会启动第一轮中欧高等教育合作计划以来,欧盟委员会对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中国高校的欧洲研究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并通过陈志敏和戴炳然两位教授获得的让·莫内教授项目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直接的支持。我们相信,在三方机构的支持下,本丛书的出版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和可持续的计划,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学者对欧盟,特别是欧盟对外关系的研究。

最后,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本丛书计划的大力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着高品质出版社的良好声誉。我们也希望在出版社各位同仁的努力下,本丛书的学术质量可以得到全面保证。

编者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导论	1
一、选题由来	1
二、研究现状	2
三、主要内容	7
第一章 地区间主义理论	11
一、地区间主义的定义	11
二、地区间主义的表现形式	14
三、地区间主义的动力与功能	20
四、地区间主义的应用	31
第二章 欧盟地区间主义实践	47
一、欧盟地区间主义的轮辐体系	47
二、欧盟地区间主义的新旧比较	55
三、欧盟地区间外交的利益诉求	58
四、欧盟地区间外交的对象差异	61
第三章 冷战后欧盟对东盟的战略构想	72
一、新亚洲政策的关键要素	72
二、新伙伴关系的真正潜力	77
三、传统关系的战略升级	81

第四章 欧盟对亚欧会议的战略期待	87
一、地区战略的新需求	87
二、伙伴关系的新建构	93
三、政治经济的新效用	101
第五章 欧盟双层地区间外交的战略互持	111
一、地区战略设计的内在互补	111
二、专项政策制定的潜在互助	115
三、欧亚地区间贸易自由化案例	122
四、亚欧会议扩员案例	135
结论	155
参考文献	174

导 论

一、选题由来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与欧洲存在商业贸易联系的一些域外国家出于对共同体市场排外性的担忧,纷纷开始寻求新的更大的市场准入。1972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通过其设在布鲁塞尔的东盟特别协调委员会(Speci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ASEAN, SCCAN)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建立了非正式的对话关系,以期为双方的经贸联系搭建定期的沟通渠道。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因此成为东盟的第一个非正式对话伙伴。1977年2月,东盟外交部长特别会议提议,东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部长理事会和常设代表委员会建立联系。这一建议在同年7月5日至8日召开的第十次东盟外长会议上获得通过。继而,东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正式对话关系得以确立。以此为基础,1978年9月第一届东盟—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级会议(AEMM)在布鲁塞尔召开。1980年3月7日,在第二届AEMM召开之际,《欧共体—东盟合作协定》在吉隆坡签署,从而标志着欧共体与东盟关系的制度化。迄今为止,欧盟与东盟的伙伴关系已遍及诸多领域,“从政治对话、非传统安全合作、贸易与投资关系、互联互通到合作推进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共同体建设”¹,并已成为欧盟“发展一项更为丰满的亚洲战略的关键”²。

冷战结束后,欧盟与东亚的关系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1994年10月12—14日,由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第三届欧洲—东亚经济首脑会议在新加坡举行。此次会议通过的《新加坡行动纲领》强调:“欧洲与

东亚现有的所有合作机制(包括欧洲与东亚经济首脑会议),需要放在欧洲与东亚政府首脑会议这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来讨论影响这两个地区关系的各种问题。”³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利用访问法国的时机向欧盟提出了召开首届亚欧峰会的倡议。1995年3月,欧盟部长理事会作出决议,支持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同年5月,欧盟与东盟在新加坡召开高官会议,决定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将于1996年3月召开。1996年2月2—3日,东亚10国外长在泰国普吉岛召开会议,讨论《亚欧会议主席声明》的修改意见,再次协调东亚国家的参会立场。在此基础上,1996年3月1—2日,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目前,亚欧会议成员已达54个,囊括政治对话、经贸合作、社会文化及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三大支柱,是“欧洲与亚洲之间关键性的地区对地区对话”,同时也是欧盟用以“促进亚洲理解和支持欧盟解决全球问题方法”的重要平台。⁴

就此而言,欧盟与东亚之间的地区间安排呈现出双层的表现形态。⁵其中之一体现为欧盟与东盟在东南亚次地区层面所建立的以部长级对话为最高层级的集团对集团关系,而另一层则表现为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东亚国家在地区层面所开展的高至首脑级别的地区对地区互动。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欧盟—东盟对话与亚欧会议论坛存在着层级上的差别,但亚欧会议并不只是首脑会晤的场所。事实上,亚欧会议的大量工作都是在部长及其高官层面进行的。⁷而欧盟与东盟则在独立开展双方部长级对话和合作的同时又参与到亚欧会议的进程当中。那么,笔者不禁要问:作为享有地区间主义“中心—轮辐”体系(hub-and-spokes system)构建者与主导者之称的欧盟⁸,究竟如何看待它与东亚地区这种相互交叠的地区间关系?这究竟是一种制度冗余,进而反映出欧盟地区间主义战略的实用性混杂,还是一种制度互补,从而体现出欧盟地区间外交的理性考量呢?这种双层地区间安排对于欧盟实现其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意义又何在呢?于是,冷战后欧盟对东亚的双层地区间外交自然成为本书研讨的主题。

二、研究现状

总体而言,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对话机制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

议题的确引发过国内外学术界的热议,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⁹,但对于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则并不多见。国外学者于尔根·吕兰(Jürgen Rüland)在讨论欧盟—东盟关系时较早地提到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通过创建包括东盟—欧盟部长级会议和亚欧会议在内的平行结构,欧亚地区间主义在国际制度建设的问题上造成了冗余。亚欧会议反映出东盟在国际论坛中政治影响力的缺失,而且它正在接管之前双地区关系(笔者注:欧盟—东盟关系)的功能。虽然后者并未完全退出舞台,但它却日益滑向了无关紧要的境地,正如最近一次在万象所召开的部长级会议所显示的那样”¹⁰。多年以后,在吕兰编辑出版关于地区间主义与国际关系的系统性著作时,这位地区间主义研究领域的专家仍在关注涉及地区间主义制度建设功能的这样一种现象。他所提出的问题在于:“国际关系中究竟存不存在所谓制度冗余?制度之间是否存在分工与互补的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竞争以及对抗?”¹¹

在他看来,如果考虑到海纳·亨吉(Heiner Hänggi)所概括的如此多样的地区间对话关系,那么各种各样的地区间安排看上去就真像是一组又一组松散的政策拼图,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它们之间所谓缺失的联系,进而造成了不必要的制度重叠。吕兰认为,欧盟—东盟对话与亚洲会议的并行存在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例子。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存在着制度重叠的情况,而且事实上欧盟—东盟对话的绝大多数功能都已经被亚欧会议所消化,然而,不论是欧盟还是东盟似乎都没有兴趣将这两种制度安排进行精简。这实际上印证了一种观察,即过时的地区组织很少有被正式解散的情况,而这也提出了为何这些论坛仍将继续存在的问题。”¹²

作为国内学术界系统研究亚欧会议的专著之一,《亚欧会议研究》一书在谈到亚欧会议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时也特别指出,亚欧会议的内部区域集团(如欧盟—东盟合作协定)影响了亚欧会议的可持续发展。因为一方面欧盟与东盟签订的双边协定具有约束力,这与非正式的松散的亚欧合作模式明显不同,从而需要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另一方面,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合作机制在某些领域存在着功能性重

合。¹³此外,在亚欧会议研究领域著作颇丰的新加坡学者杨丽惠(Yeo Lay Hwee)博士曾经就欧盟与亚洲关系中的地区间向度,即欧盟与东盟关系以及亚欧会议进程进行过专门的探讨。虽然这项研究并未集中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分别加以论述,但该学者在谈及亚欧会议未来发展前景时还是指出,亚欧会议仍将作为欧亚关系的一部分存在,然而它却不可避免地要与像欧盟—东盟这样的论坛争夺关注与资源。¹⁴

以上是国内外学术界认为欧盟—东盟关系与亚欧会议形成制度冗余且并无多少附加价值的代表性观点。而在笔者看来,判断这两种并行的地区间安排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负有冗余之嫌,其标准并不完全在于成员是否存在重叠、功能是否存在重合、议程是否存在重复。因为亚欧会议不仅包含了欧盟与东盟及其两者的成员国,而且包括了东盟之外的其他东北亚国家。对于满足欧盟与整个东亚地区的对话诉求来讲,欧盟与东盟这样一种在次地区层面的关系自然扮演不了这样的角色。既然是两个层面的地区间安排,其议程有所重复也并不为怪。关键还在于不同层面的不同安排是否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就亚欧会议而言,其与欧盟—东盟关系的区别主要被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亚欧会议倡议与正在进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东盟对话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差异:尽管后者是基于双边关系并集中于合作与发展援助,然而前者却是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和所涉问题的多样性原则基础之上”¹⁵;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欧会议是欧共体/欧盟与东盟对话机制的‘改进版’,政策对话的范围扩大了,组织方式也有所改进”。相对于欧盟—东盟对话来讲,亚欧会议不仅确立了分领域对话的机制,而且把非政府部门的参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渠道推动这方面的交流¹⁶;第三,亚欧会议本身所坚持的非正式性质,使其对于敏感性议题的讨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¹⁷;第四,鉴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欧盟力图通过亚欧会议使欧亚关系机制化,同亚洲发展某种程度的政治性战略关系,借助亚洲扩大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增强与美在欧争夺主权的能力,为尽早成为独立一极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¹⁸;第五,“亚欧会议机制的存在,有助于保持东亚几种力量的动态均衡,从而部分地消解了东亚国家和作

为介入力量的美国在发展东亚地区主义时的内在矛盾和紧张”¹⁹。另外,相对于作为双方最高层级对话机制的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而言,亚欧会议则为欧亚双方在首脑层面开展对话与合作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如果说上述看法表明了亚欧会议所具备的相对独立的意义的话,那么欧盟—东盟关系的特有价值则在于,东盟处于“10+3”进程和东盟地区论坛的驾驶席,它“能够作为一个可靠而诚实的经纪人扮演一个中心角色并推动这些论坛和机制产出结果”,进而有助于形成正在演变中的东亚结构。²⁰

尽管上述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对话并非简单的制度冗余,然而它们尚未就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出对应的答案。其他学者则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回答。比如韩国学者杨胜勇(Yang Seung-yeon)认为:“尽管启动了亚欧会议,然而东盟却继续举行东盟—欧盟部长级会议,这表明它将继续强调东盟的独特机制。”²¹在他看来,亚欧会议创建的目的之一在于促进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亚欧会议被期望从增强东盟的实例中获益:它将界定东南亚和欧洲在亚洲地区的新角色,同时通过提供欧洲的支持来提升东盟的国际地位。”²²相对而言,国内的潘光教授在此问题上的分析更具针对性。他指出,除亚欧会议外,亚欧之间目前还存在其他三个层次的合作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地区组织之间的双边合作,如东盟与欧盟的对话机制。总的来讲,“亚欧会议与相关亚欧间合作机制的关系不是一种零和关系,而是一种既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又相互牵扯、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每一种合作机制都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亚欧间双边合作机制是亚欧会议多边合作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亚欧会议也为亚欧之间的双边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和协调平台。”²³具体到欧盟—东盟合作机制与亚欧会议,前者的发展促成了后者的启动,而后者的发展又促进了前者的深化。当然,潘光也承认,在亚欧会议内产生的问题和困难也会对相关亚欧间双边合作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反之亦然。他还强调:“亚欧会议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将亚欧国家间的对话过程加以定期化和制度化,实际上就是为亚欧间具体合作项目做前期的思想、政策准备。”²⁴

潘光是国内学术界少有的在研究亚欧会议的同时专门关注它与其他亚欧合作机制之间关系的学者。他所提出的亚欧会议与其他亚欧合作机制相互作用的观点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而,他对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机制之间关系的讨论并未体现出同其他国家层面的双边合作关系,以及国家与地区组织层面的双边合作关系有何不同。杨胜勇虽然点出了欧盟—东盟的独特潜力,但他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一潜力是如何作用的,因而他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某种模糊性。实际上,国内学者甚至包括东亚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学者对于亚欧会议以及欧盟—东盟关系的考察都是在就事论事。与欧美学者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基于理论的分析框架,没有将这些具体的地区间安排纳入到一个更为抽象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自然也就很难从实证研究中有意识地去提取对于理论的贡献要素。如果我们认可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对话机制是地区间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那么对于两者本身的考察就应当从地区间主义的角度来进行,至于其相互关系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未来研究的一个首要向度就是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弄清楚地区间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地区间主义的相关功能及其发挥作用的途径与方式,而后才能根据具体的地区内形势和地区间诉求构建一个可用于解读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对话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

前面我们提到过吕兰关于看似过时的地区组织却仍旧存在,进而与新的制度安排并行的疑惑。在他看来,“如果从体系的视角来考察,那么多重的地区和地区间论坛形成‘多重地区主义’的现象,从而错误地分配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稀缺的资源,并阻碍了更加有效的地区制度建设”²⁵。然而,他认为“一种可能的答案或许在于,地区间论坛或许具备着某些宏理论所不曾预见以及通过体系层面的分析所不能涵盖的功能”。他进一步解释道:“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看,地区间对话也许对于民族国家发挥了象征性的作用,抑或为合理化双边会议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²⁶吕兰的这一思路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研究亚欧会议与欧盟—东盟机制之间的共存与并行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体系层面向下俯视,同样也应当尝试着换一种视角,即从单元层面的行为体出发去进

行平视。但是,参与亚欧地区间关系的行为体既有地区性的也有国家型的,具体到国家来讲又有大小强弱之分,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选取一个合适的行为体作为分析的起点和基点呢?

我认为,这既要考虑到地区间主义的地区对地区互动的本质,也要参看各自地区内在的合作形式。在此意义上,欧盟与东盟显然是比较合适的两个行为体。一般来讲,由于欧盟—东盟对话机制和亚欧会议均是来自东盟的倡议,因而研究者往往倾向于从东盟的视角来看待这两种地区间安排本身及其相互关系。但不可忽视的另一个事实则是,在上述地区间互动进程中,无论是在实力对比上,还是在制度优势上,更是在地区间主义的实践上,欧盟而非东盟才是真正具备能力、战略、资源和经验的行为体。因此,从欧盟的视角考察其地区间外交在东亚的两个特定的制度安排,从而分析两者在实现欧盟亚洲战略方面的价值与互动性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当然,东盟和东亚地区其他行为体作为外交客体,也是欧盟作为外交主体制定和实施地区间战略的必要考量。

三、主要内容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归纳、概括、总结地区间主义现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并把握住理论综合的总体趋势,尝试着从要素整合与视角转换两个方面同时推进,提出政策、权力、制度与角色四个向度,以解释欧盟是否以及在一般意义上如何同其他地区创建地区间联系。第二,根据东亚地区的特定形势,继而在欧盟地区间主义战略一般选择路径的基础上,提出区内主导力和区间影响力概念,用以创建分析欧盟对东亚双层地区间外交的基本框架。第三,根据欧盟针对亚欧会议和欧盟—东盟对话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解读欧盟对亚欧会议和东盟的地区间外交的动因、战略与举措,进而寻找两者在欧盟的全球与地区战略框架下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关系。第四,以欧亚地区间自由化为例,分析欧盟—东盟对话之于亚欧会议的驱动效应。同时以亚欧会议扩大进程为例,分析亚欧会议对欧